

当代汉语散文 流变论



袁勇麟 著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汉语散文流变论 / 袁勇麟著 .

—上海 : 上海三联书店 , 2002.6

(三联文博论丛)

ISBN 7-5426-1684-6

. 当... . 袁... . 汉语 - 散文 - 文学研究 - 世界
. I207.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33343号

当代汉语散文流变论

著 者 / 袁勇麟

丛书策划 / 苏 梦

责任编辑 / 苏 梦

装帧设计 / 范 峤青

责任校对 / 李京林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235) 中国上海市钦州南路81号

<http://WWW.sanlianc.com>

E-mail/sanlianc@online.sh.cn

印 订 / 江苏省宜兴市教育彩印厂

版 次 / 2002年6月第1版

印 次 / 2002年6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 890 × 1240 1/32

字 数 / 160千字

印 张 / 8

印 数 / 1-3100

ISBN 7-5426-1684-6

I · 191 定价 : 16.00元

总 序

钱谷融

上海三联书店要我为他们即将出版的《三联文博论丛》写序，这一套丛书共有十一本，其中倒有三本是我的学生所写，我当然是义不容辞的。但是说实话，我是很有些惶恐的。记得很多年前，当教育部决定要在大学文科招收博士研究生的时候，有一次碰到北大的王瑶先生，他对我说：“要我指导博士生，但我连博士究竟是圆的还是方的都不知道，叫我怎么指导呢？”现在上海三联的这套丛书内容丰富，涉及的方面极广，有许多是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的，哪有我置喙的余地呢？继而一想，人家不过是找你写篇序，又不是要你写评论，何必这样惶惶然呢？那么，就随便谈点个人的希望和想法吧！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涌现了不少新人，他们大都是从大学刚毕业的研究生，有博士，也有硕士。他们年轻，充满了朝气，常能作出一些想前人所不敢想、发前人所未曾发的建树，学术的前进和发展，主要就

寄托在他们身上。但是学术研究，毕竟不同于堆柴垛，后来者不一定就能居上，一切有赖于自己的孜孜不倦、锲而不舍的努力。只有钻研得深了，才能把握对象的本真，才能有新的创获。想来年轻的朋友们，总该不会因自恃来日方长而因循怠惰下去吧！

其次，学术上的某种创见，在它初出现的时候，不一定就很完善，它往往只是露了一点苗头，还有待于大家的扶植与灌溉。学术是天下的公器，爱护它、帮助它顺利地成长是每一个学术工作者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倡议者尤其不应就此撒手不管。

再有就是前些年也不断见有博士论文和硕士论文被出版，但都是零星的、个别的，这次这套《三联文博论丛》却较为集中地展示了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文学博士们的新成果。他们的成就和水平，他们的优点以及他们的欠缺，一一都展露在人们的眼前，可供今后改进研究生教育工作的参考。当然，这是有赖于各方面读者的不吝赐教的；我们热切地期待着。

二 二年六月五日

导 论

当代汉语散文的人文背景

20世纪以来，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欧美传统散文日趋衰落，难以为继，而当代汉语散文却长盛不衰。无论是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还是在海外汉语文学中，散文创作都非常壮观，形成多元发展、共生互补的繁荣鼎盛的整体格局，堪称20世纪世界文学中一个独特的人文景观。美国学者约

不少中外学者都谈到二战以后，由于西方广播、影视事业的发展，报纸副刊不愿为散文提供篇幅，以及定期文学刊物的凋零，导致了欧美传统散文创作的衰落。如夏志清说过：“在现代英美方面散文也不很发达。……欧美现代文坛很多人对诗和小说从事专门研究，而且相当完整。但对散文他们已不大热衷。”见痲弦记录《夏志清谈散文》，台湾《幼狮文艺》1970年4月号。又如余光中在《李清照以后》一文中也认为：“散文一道，在西方的现代文坛似已日趋沉寂，18、19世纪大师辈出的盛况，已经淹没于大众传播的新闻报导和杂文政论了。英美各国报纸的副刊，例皆不登创作，文学刊物则以小说与诗为主，批评也罕及散文。普立策奖只给诗人、剧作家和小说家，却不为散文家而设；传记虽为其中一项，但并不等于散文。诺贝尔文学奖大半颁给诗人、小说家、剧作家；像卡内提那样凭文集得奖，却是罕见，但是卡内提的声名亦有赖小说与戏剧，不纯靠散文。”见《余光中散文选集》（四），时代文艺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515页。

翰·坎农在《中英随笔比较》一文中指出：

我要讨论的最后一点是中英随笔的不同命运。断然下结论说英国小品文已失去了生命力，而中国小品文正在繁荣兴旺，也许并不过分。要看这两者的差别，我们只要看看作为新闻媒介的两国报纸就可以了。中国有声望的报纸，没有哪一天不留下至少一页的版面来刊登散文，题材范围不拘，既有随笔，也有报刊散文，多数报纸还有周末增刊，几乎完全用来刊登散文，而英国报纸定期让出固定的篇幅来登随笔却十分难得，即使这样做了，也显得十分反常。但是不管怎么艰苦，怎么不安定，散文家如果用汉语写作总能生存；如果用英文写作，就会挨饿，只好依赖编辑的施舍为生。在台湾和香港，人们广泛地阅读和讨论散文集，有些甚至成了畅销书；在西方，你若建议某一出版商给你出版一本散文集，那么你就会遭到任何自尊心很强的出版商的冷眼，这种建议也只能得到这样的下场。

潘旭澜教授在主编涵盖中国大陆、台港澳以及海外汉语散文精粹的《当代散文精品珍藏本》时，也有过独到的发现和精辟的论述：

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不但是人类命运的转折点，也给汉语散文开拓发展空间。随着和平的到来，社会生活转向

约翰·坎农：《中英随笔比较》，金文俊译，《扬州师院学报》1990年第2

正常，更多中国人到海外，华侨办的学校、报刊的迅速增加，汉语白话散文也就得到了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在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之前，海外华侨华人的散文，除了在当地报刊发表之外，有相当一部分，在台湾、香港发表和出版。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改革的深入和开放的扩大，为世界各地汉语散文的发展、交流和整合提供了新的可能。没有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海外寥若晨星的汉语散文，便会隐没消沉，更谈不上后来的发展。没有改革开放，中国内地的散文就会成为世界文学海洋之外的湖泊；海外汉语散文便同文化母体隔离，造成不可避免的错位和偏枯。现在有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使它内部的诸群体得到初步的交流，在有限的交流中得到互补互促。作为一种跨国跨地区的奇特现象，由于内部的交流，便有可能在世界文学中得到应有的重视与位置。

正是在共同的民族文化精神和文学传统的基础上，不同区域的汉语散文相互融合，博采众长，不仅创造了近半个世纪来汉语散文在世界文学中一枝独秀的非凡业绩，而且也为21世纪汉语散文的再度辉煌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一节 当代汉语散文的文学源流

中国是个有着悠久散文传统的国度。作为一个文类，散文

潘旭澜：《我编散文珍藏本》，见《长河飞沫》，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7月版，第146-147页。

一直在中国文学中占有不可替代的位置。郁达夫说过：“中国古来的文章，一向就以散文为主要的文体，韵文系情感满溢时之偶一发挥，不可多得，不能强求的东西。”杨牧也认为：“散文之为文类（literary genre），只有在中国文学传统中才看得出它显著的重要性。西方文学以诗、戏剧和小说为主，虽然其中曾经出现了一些结构圆融辞藻华茂的散文作品，藉着它突出的艺术渲染和思维趣味，大略可以成为一种文类，但西方散文，不论长篇论著，或短篇小品，其赖以维系共相而成为文类的条件却又十分参差脆弱。”因此，“散文是中国文学中显著而重要的一种类型，地位远远超过其同类之于西方的文学传统”。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以及海外的汉语散文，虽说是在相对隔绝的情况下各自独立发展起来的，但它们都同属于中国文学的延伸，同属发端于“五四”新文学的现代散文的延伸。

在中国大陆，新时期之前的散文创作，主要继承40年代解放区以记叙为主的纪实性散文和古典散文，前者导致建国初期“通讯”、“报告”、“特写”盛极一时，后者则促成60年代初期“诗化”散文的创作热潮。新时期以来，为了挣脱“工具论”、“武器论”、“轻骑兵说”、“形散神不散”等诸多框框和模式，老一辈散文

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 导言》，见《中国现代散文理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5月版，第441页。

杨牧：《中国近代散文》，见《当代台湾文学评论大系·散文批评卷》，台北正中书局1993年5月版，第124-125页。

吴周文在《“杨朔模式”及其悖失态势》一文中谈到整个十七年的散文是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断的历史背景下发展的，它对古典散文、诗词表现出比现代散文更大程度的认同。见《散文十二家》，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12月版，第9-10页。

作者回归“五四”散文传统，他们在散文创作中高扬个性意识、文化品位和文体意识，使现代散文传统得以薪火相传。汪曾祺特别提到新时期小品文崛起这一文学现象，他说：“我没有研究过现代文学史，但觉得小品文在中国的名声似乎不那么好。其罪名是悠闲。中国现代小品文的兴起，大概是在30年代。其时正是强邻虎视，国事蝸蟻的时候，悠闲总是不好。……因为怕被人扣上悠闲的帽子，40年代写小品文的不多，50年代简直就没有什么人写了。‘小品文’一直带着洗不清的泥渍，若隐若现。小品文的重新‘崛起’，是近十年的事。”“也许这说明读者对人，对生活，对风景，对习俗节令，对饮食，乃至对草木虫鱼的兴趣提高了，对语言，对文体的兴趣提高了，总之是文化素养提高了。”与此同时，年轻一代散文作者不满足于恢复和因袭二三十年代的散文传统，他们表现出超越的激情。散文家斯妤在1992年就指出：“无论是十七年间形成的‘三家’模式，还是现代文学史上的百家手法，都已不够，甚至不能很好地、完全地反映当代人的思考、探索、焦虑、苦闷，传达现代人的复杂情绪与丰富多变的心灵。散文必须在思想上、形式上都有大的新的突破，才能和这个急剧变化的时代相称，和这个时代日益丰富复杂的心灵相称。”因此，她认为散文家应该具有强烈的创造意识，不因循守旧，不墨守成规，广采博收，从20世纪丰富绚烂的文学成果中汲取营养，立志在文体上、形式上、语言上创新拓展，创造出真正

汪曾祺：《汪曾祺小品·自序》，见《汪曾祺散文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12月版，第256-257页。

汪曾祺：《蒲桥集再版后记》，同上书，第253页。

属于当今时代的“新文体”和“新形式”。

在台湾，比起小说、诗和戏剧，散文更大程度地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和“五四”文化余韵，成为台湾文坛最能保持中国传统中国气派的一种文体。从文化背景看，一方面是因为“在20世纪的西方文学里，散文，尤其是亲切可诵的小品文，却是很弱的一环”，无可借鉴；另一方面，“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和五四新文学在来台作家间的流风余韵，仍然有极为巨大的潜力”，使得散文家向其“频频索取养分”。台湾老一辈的散文家大都是在故纸堆中下过功夫的，对中国古典散文了若指掌，如数家珍。林语堂就多次在文章中推崇孟子弘毅自信、雄辩善讽的文风，欣赏苏轼气充词沛、行云流水的笔法。中年一代散文家也大都对古典散文持一种肯定的态度，如余光中虽然主张“下‘五四’的半旗”，但他每每以中国古典散文作为标尺与典范。他说“五四早期的散文，最流行两千字以内的小品文，常带感性。这种文体有其清新自然的优点，却也有其局限，好像认定散文的正宗就是晚明小品，却忘了中国散文的至境还有韩潮澎湃，苏海浩茫，忘了更早，还有庄子的超逸、孟子的担当、司马迁的跌宕恣肆。圣贤之境吾所不敢，但是韩潮苏海却令我心向往之。同时五四以来的散文阴柔成风，迁台初年余风犹盛，我乃有意向韩愈乞借淋漓大笔，挥而扫之，一面又写《剪掉散文的辫子》那样的文

斯妤：《散文需要新的思考、新的活力》，《散文百家》1992年第7期。

余光中：《向历史交卷——中国现代文学大系 总序》，见《余光中散文选集》（二），时代文艺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455、453、452页。

章，鼓吹革命”。年轻的一代散文家也并未斩断与传统文化的联系，陈幸蕙就认为：“古典文学对我有很关键性的影响，我现在创作的养分，可以说百分之六十是从古典世界里来的。对我来说，那是我创作的巴颜喀拉山，是写作的源头所在。”就连在散文创作中常有大胆出格和反叛的林耀德，也不否认中国古典散文给予他的滋润，坦承自己对王安石和张岱的酷爱。至于五四散文，更是可以从台湾老、中、青三代散文家那里找到流风余韵。香港浸会大学林幸谦指出：“台湾‘复兴时期’以来的散文发展状况，基本上可沿顺五四的散文脉络探寻各家流派的来龙去脉。在小品文和随笔方面……吴鲁芹、颜元叔和邱言曦等人则承续了周作人和林语堂的风格。在美文/纯散文方面，尤其是抒情写景之文，林文月、张秀亚、琦君、张晓风等人，继承发扬了徐志摩、朱自清和许地山等人所开创的散文格局。……在专栏或方块文章的成就，则有李敖和柏杨等人承续，更进一步发挥了鲁迅式政治性杂文的特色，尤以批判政治和社会为甚。这些发展轨迹，说明了台湾散文的整体脉络和五四散文的关系。”

香港和澳门虽然长期以来沦为殖民地，但是，两地居民绝大多数是中国人，他们在语言文化方面与中华母体有着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柯灵就认为：“香港地处南天，一岛孤悬，万流云

余光中：《十二文集——散文选集自序》，见《余光中散文选集》（一），时代文艺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5页。

见《陈幸蕙访谈》，原载台湾《文艺月刊》第255期，转引自《台湾文学史》（下卷），海峡文艺出版社1993年1月版，第430页。

林幸谦：《九十年代台湾散文现象与理论走向》，《文艺理论研究》1997

集，尽管百五年来世局播迁，沧桑多变，绵邈的华夏文化传统，如一灯不灭，烛照海岸。” 因此，不仅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五四”新文化运动奠定的现代文学传统也在港澳地区得到延续和传播。以小思（卢玮銮）为例，她说：“自小至大，我一直接触古典文学，由小学开始就读古文和诗词。” 她的散文常常充满古典诗词的风味。同时她又说：“我最感兴趣的是丰子恺。自幼就看他的漫画，初中时读他的散文，很欣赏他的为人，和他对天地万物的态度，实际上是喜欢他的人多于他的作品，不过通过他的作品可以更了解他的为人。” 她的散文因而又具有现代白马湖派作品的余韵。如小思以丰子恺漫画为蓝本而加以演绎发挥的随笔小品集《丰子恺漫画选绎》，文字精致，情韵动人。在《翠拂行人首》里，作者运用颇具古风的精练文字，着力挖掘丰子恺漫画中蕴含的丰富深切的人生意蕴：身处“天苍苍，野茫茫”的塞外漠北，气凉风塞，万物萧瑟，回想江南十里春色，不禁令人感叹时光流逝的苍凉，而往昔却总还似残梦一般悠长，剪不断，理还乱，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香港学者黄继持认为小思以《丰子恺漫画选绎》中的文章，“已可跻身于当年白马湖畔散文作家之列”。他还指出在香港作家中，“小思又是最能承接二三十年代中国散文传统的一位。就其所追慕的丰子恺夏丏尊那一路而言，寢目有青胜于蓝之势。那一种散文，50年代以来在大陆式微；而小思于香港所接受的中国人文精神教育，却培植了她那份

柯灵：《彤云笺·序》，香港华汉文化事业公司1990年10月版，第1页。

许迪锵、朱彦容：《卢玮銮访问记》，《香港文学》第3期。

同上。

黄继持：《试谈小思》，《香港文学》第3期。

温厚诚挚而又活泼鲜妍的文学心灵，此中有‘五四’以来富于理想但不卷入激进漩涡那类优秀文人的身影”，“她的笔锋，虽未能多所刺入现代香港工商业社会的核心，却能写出那仍然存在于香港的中国文化性格善良清明的一面”。

不仅中国大陆和台港澳的散文家深受悠久灿烂的中华文化传统的濡染，即使是移居海外的华族，他们下笔作文时也离不开中国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的影响。泰华散文家司马攻曾说过：“中国是一个散文极度繁荣的国家，……散文是中国的‘特产’，是最能体现中国文字感情的文体。因此，如果包括泰华作者在内的，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华文作家，今后还要以母体文字——汉文，来从事写作；尤其是用汉文来写散文，总脱离不了中国的散文传统，还会受到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等地的散文风格、文句、词汇的影响。” 美华散文家木令耆则进一步探讨了海外作家之所以大量选择创作散文这种“最接近中国传统的文学形式”的原因：

他们虽然生活在海外，在一个异国的传统中，可是当他们从生活中提炼生活经验的结晶时，他们却逃不出在他们心灵中烙印着的中国文化传统，而用中国文学的散文形式来表达他们的精神感受。

这是因为他们成长时代，读过那许许多多杰出的散文

黄继持：《就“香港性”略谈小思的 承教小记 与西维的 合金菩萨 》，见《寄生草》，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9年5月版。

司马攻：《略谈泰华散文的过去与未来》，见《泰华文学漫谈》，曼谷八音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49页。

作品，他们忘不了《秋声赋》、《赤壁赋》、《五柳先生传》和《陈情表》等等，可是由于他们多半成长在五四运动以后，他们更忘不了《寄小读者》、《往事》、《背影》、《荷塘月色》、《落花生》、《我所知道的康桥》，和那短小精悍，既尖利，又泼辣的鲁迅“杂文”。

因此，木令耆认为，如果海外华人作家继续用汉语创作，他们必然脱离不了中国文学的传统，尤其是中国散文的传统，而且在散文形式上，他们将继续发展这特殊的中国文化传统。确实，大陆散文家袁鹰在1985年选编台港澳及海外汉语散文作品时，也指出：

我们的作者们，都是吸吮中国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的乳汁成长的。

他们写的都是道道地地的中国散文。

先秦诸子的睿智，两汉文章的雄健，魏晋六朝的华美，唐宋八大家的深厚和潇洒，明清小品的秀逸，都能找到一些姿影，听到一些回声。

“五四”以后六十余年来散文大家的影响——鲁迅的邃密，周作人的冲淡，冰心的婉丽，郁达夫的深沉，朱自清的精美，叶圣陶的谨严，梁遇春的从容，许地山的朴质，丰子恺的细腻，郭沫若的奔放，巴金的深情……也都同我们大陆上不少散文家一样，在作品里都能各个找到一些文学渊源。

木令耆：《海外华人作家散文选·前记》，花城出版社1986年3月版，第4页。

文学传统的长河，总是绵延不断的。

汉语散文共同渊源于中华民族的文化母体，有着相同或相近的语言形态，以及隐含在语言之中的民族性格、心理、情感、思维方式和浮现于语言之上的道德规范、价值取向、人格理想、生活态度、审美观照，因此，半个世纪以来的汉语散文史堪称“一部民族文化性格的演变史，一部民族审美性格的变迁史和发展史”。

第二节 当代汉语散文的文化语境

与其他文体一样，散文的健康发展取决于一个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政治开放、思想多元、艺术民主、个性活跃等因素，都是散文繁荣必不可少的客观条件，大陆和台港澳半个世纪来散文发展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而海外汉语散文的发展，除了上述原因外，还与所在国汉语教育、华文报刊和图书市场的兴衰等密切相关。

中国大陆当代散文在前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内循环系统中，缓慢而有限地发展，无论创作方法，艺术个性，还是品种样式，风格流派，都比较单调，甚至趋于雷同化、模式化、公式化。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社会环境、政治气候以

袁鹰：《海天·岁月·人生 序》，见《冬眠后的复苏》，花城出版社1990年12月版，第110页。

楼肇明：《乡愁之血浓于水》，见《旧时的河床》，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年8月版，第2页。

及与此二者密切相关的文艺思潮”的失误和偏颇，“政治上‘左’的倾向，造成了社会生活的许多反常和荒谬，污染了人们的思想感情，使很多人将不少反科学、反良知的东西当作真理。受政治支配的文艺思潮，屡屡将创作驱向坎坷小道。在这样的环境下，思想感情被扭曲或被套上镣铐的作家，艺术创造的余地极为狭窄，而且必然带着或深或浅的‘左’的烙印。诗歌标语口号化，小说、戏剧图解政策，是相当普通的现象，散文又怎能幸免”。只有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思想个性的解放，封闭体制的打破，艺术视野的扩大，才使大陆散文经历了长时间的徘徊与停滞之后，迎来了真正的转机，散文从文学类别的边缘和冷门迅速成为门庭若市、熙熙攘攘的“公共空间”。一直关注和追踪新时期散文创作发展变化的韩小蕙在谈到20世纪90年代这场可称为革命性的随笔崛起及其前卫的散文热潮时指出：“近年来我国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诸方面的进一步开放，使得过去那种‘我花开罢百花杀’的局面成为历史。对于已十分习惯以一种观念思维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他们突然发现了世界的丰富多彩，其惊异和新鲜感的冲击简直不亚于一场人生大地震。眼界越开阔就会有更大的开阔，精神的双翼几乎可以伸向无涯，不单读者，就连作家本身，也都像重新开始了一个生命似的，叩响了新的心音。像金克木先生，十几岁时的随笔就已写得‘不悔少作’，中间隔了五六十年的空白，现在终于又火山一样地喷发出来。问其原因，老先生只是淡淡地简答了六个字：‘现在可以写了。’一言道出了一

潘旭澜：《法外求法——散文突破漫谈》，见《长河飞沫》，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7月版，第162、169页。

种广泛的心态。” 被称为“思想随笔新三家”之一的谢泳也认为，写文章最重要的是自由心态，而且自由的心态得之于自由的生存空间。他说：“九十年代的散文写作比过去有了很大的进步，这首先不是因为九十年代写文章的人比八十年代的人在写作技巧上有了什么长进，而是因为九十年代写文章的人都明白了一个写作的基本前提，这就是文章不能总说别人的话，总说自己并不想说的话。另外是能写自己的文章首先要有一个能自由说话的空间，在这方面，九十年代比八十年代好一点，所以散文也就多了一些生气，好散文都是说真话的，都是说痛话的。一九四九年以后散文之所以失去了自我，并不是因为写文章的人没有了技巧，而是因为没有了说真话的条件，没有自由的心灵，也就没有什么好文章了。”

国民党政府迁移台湾后，在思想文化领域采取一系列强化统制的政策。1949年5月颁发了《台湾地区戒严令》，宣布台湾处于“战争动员状态”，实行全面“戒严”。同时，在岛内实行“报禁”、“出版禁”，严禁一切违禁言论、讲学、演说、新闻杂志、图书告白、张贴标语等自由。1952年4月，又公布了《台湾出版法》，在极大的范围内控制了台湾的舆论机构与阵地。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台湾早期散文出现软硬两种主要倾向。“硬性散文”即是有强烈反共意识的“战斗散文”，“用阳刚的文体来歌颂战士的英勇事迹、赞美英雄的伟大精神、宣誓效忠国家的耿耿忠心”，“文章中不乏口号式的宣言”；“软性散文”即继承冰心《寄小读者》

韩小蕙：《随笔崛起与新现象随笔》，见《新现象随笔》，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2-3页。

谢泳：《九十年代散文写作随访》，《美文》1998年第12期。